

以“公共厕所”入题，确实有些不雅；但没办法，这回不是做文章，只想解决问题。

公共厕所如何标识

陈平原

中国人提及“如厕”，婉辞是“方便”。如今外出，需要“方便”时，颇有感觉不太方便的。主要原因是，公共厕所的标识越来越抽象，越来越优雅，也越来越不明确。

当年山村插队，听说刚解放那阵子，村里某秀才进城，闹了大笑话，因他堂堂之走进女厕所，被人责骂而，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吾文人入厕，何罪之有？”公共厕所门口那个美术字体的“女”字，确实与“文”字很接近。

七十多年过去了，中国的经济及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即便偏僻的乡镇，也都有了公共厕所。美术字体的“男厕”与“女厕”早已深入人心，不会再发生类似的误解。



至今日，作为厕所标识的图案还在不断翻新，越来越多样化，创意感十足，但好些得琢磨一会儿才弄明白。我不喜欢模棱两可的表述，尤其反感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。

撇开大道理，就说实际效果吧。一面整洁的墙壁，一个或两个小小的图案，很不显眼。其实，民众在公共场所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及时如厕，是个大事情，不能为了氛围与美感，牺牲了方便。因为，再雅的人，事急的时候，顾不上欣赏图案是否精美。连我这样不算太孤陋寡闻的，也都会在某些优雅的场所，遇到尴尬的局面。光线昏暗，图案很小，男性/女性的差别不明显，不幸老眼昏花，必须凑近才能看清楚。而在男女厕所门口左顾右盼、东张西望，是很危险的。万一有人不怀

好意，拍照上传，说你一个大老爷们，在女厕所门口窥探(谁知道那是女厕还是男厕!)，真的有理说不清。

我的诉求很简单，建议有关部门通令全国，凡属于公众厕所的，其标识可以是图案，但必须包含(乃至突出)文字。至于是否加外文或少数民族文字，视场所及需求而定。

凡标识或广告，都得努力平衡美观与实用、创意与恒定。厕所不是美术馆，应急是其最大功能。让几乎所有人一看就明白，不需要思索、求证与辨析，这是最最要紧的。先解决方便问题，再来谈学问、审美或个性化。

有一个问题，我没想清楚，酒店里的厕所，理论上属于酒店所有，其有权决定是否对外开放，那算不算公共厕所呢？但作为标识，我建议还是尽可能与人为善好——请顾及那些视力不好、学识欠丰、思维不够敏捷的人士，他们需要直白的提示：到底是男厕还是女厕。(2025年8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)

朱屺瞻是二十世纪末海派画坛的巨匠，他那一手泼辣豪健的中国画，被称为继白石后大写意画的又一座高峰，倍受赞誉。在朱屺瞻的艺术叙事中，常常提到他与齐白石的友谊，被称为“白石第五知己”，借以暗喻这两位有过从的大艺术家的惺惺相惜。

“白石第五知己”出于1944年齐刻给朱屺瞻“六十白石印富翁印”印章的边款。原文是这样的：“瞻仁兄最爱予刻印，予曾自刻‘知己有恩’印，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。甲申白石”。

甲申，即1944年。被白石以知己相称的不在少数，而被白石明确以“第五知己”且留下文字的只此一家，那么大家一定会问：除了朱屺瞻，其余四位知己都有谁？

对于“白石知己”，我见到过两种版本的解读，其一是上海的新闻记者陆谷苇，他在《艺林剪影》(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)“朱屺瞻与齐白石”一文中述：“艺术大师齐白石尝自谓有‘五大生平知己’，这五位究竟是谁？说法不一，笔者所闻者是：王湘绮、胡沁园、徐悲鸿、黎松庵和朱屺瞻。”

陆谷苇明确点出五大知己的姓名，但没有说明依据何在？其二是郎绍君在《齐白石》(天津杨柳青画社1997年版)：“齐白石引朱屺瞻为‘知己第五人’(被齐白石视为‘知己’的，还有胡沁园、郭人彰、夏午诒、陈师曾、徐悲鸿)”。郎绍君也指出朱屺瞻的“知己第五人”与他列举的其他“知己”五人不同，“全由购求印石的‘厚我’‘知我’而来，虽十数年‘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’。直到1946年齐白石到上海开画展，才有缘面叙。二人的友谊，以买卖印和共同的艺术趣味为基础，缺一而不可得。”

白石第五知己

唐吟方

陆谷苇是中新社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上海跑文化口的记者，遍访沪上新老画家，在那个年代写过不少书画家的报道，他熟悉上海艺坛人事，他对白石知己的解释，想来非空穴来风，列举的诸“知己”，也符合白石对“知己”的描述。宽泛意义上讲，对白石作过帮助、引导、提携、赏识、推介和收藏过其作品的，都符合白石心目中的“知己”，显然陆谷苇把朱屺瞻与前四人同视为知己，尽管意义有别，笼统而言，并无不妥。

郎绍君作为艺术史学者，在看待白石“知己”的授受上，自有立场。他已注



意到同被白石视为“知己”的场合及不同含义，细化了“知己”内涵，似乎也点出了白石在涉及艺术社交应酬中的语言机趣与人情赋予。他提到的胡、郭、夏、陈、徐，在白石的艺术家人生里是不可或缺的人物，胡沁园把白石领进艺术之门，郭人彰、夏午诒在白石艺术成长中的“五出五归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助推，难以想象有后来的白石。至于陈师曾与徐悲鸿的“知己”身份，更为艺术史所乐道，陈是促使白石画风转换的关键人物，又是白石跻身第一流画家的促成者。徐悲鸿对白石的推介含有多重意义，既借白石的新艺风反对北方画坛流行的程式化绘画倾向，也表明他对本土优秀艺术家的重视。

郎绍君在阐述朱屺瞻“知己”身份时，特别提到朱屺瞻赏识白石印章及买印赞助事，在于买印的数量特别大，引起了齐白石格外的关注。以至于白石不惜用“第五知己”来嘉许朱屺瞻。如果放在今天，大概是偶像给粉丝特殊的褒奖，虽然出于语言的虚拟，却恰到好处借用了“知己”这一重语义略隐晦的称呼，来传达内心的喜悦感激，借此升华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并给予获得者一种可说的友谊象征。

关于“第五知己”，再引一封白石当年写给荣宝斋的信作为旁证，事与朱屺瞻求白石刻印有关。原信如下：“荣宝斋鉴：承送来上海朱君之印石四方，伊之原条，写明需朱文者三方，而且方需刻十数年‘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’。边跋并上款，朱君虽然知我之刻，不要以知己压人。余年八十一矣，如此朋友，可不要。不能照刻，谨送还。九九翁白石石，二月廿二。”

白石在信中署九九翁，应是发生在1941年初的事。信中的“朱君”即指朱屺瞻，对朱屺瞻未增润笔而提出额外要求表达了不满，不过，这封信也透露了一个信息，早在1941年白石就以“知己”看待朱屺瞻，只是迟至三年后才正式落笔写下文字。当然，这封信也看出20世纪40年代朱屺瞻对白石艺术的景仰，白石艺术不光迷倒一大批普通观赏者，也引来一大批出色同行的追捧。另一方面，这封信也勾画出职业艺术家齐白石真挚坦率的本质：称兄道弟论知交，在艺术交易面前，仍恪守按质论价之道，不然，“如此朋友，可不要”。

最近二十年，中国的公共厕所数量激增，清洁度也大为提升，对于像我这样曾在山村生活多年，深知如厕不易的，感受特别深刻。可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变化，我不喜欢，那就是公共厕所的标识过于追求新奇，有时让如厕者无所适从。机场、医院等还好，基本上都是图案加文字；酒店及商场往往追求时尚，不立文字，只有图案，而图案又变化莫测，且面积越来越小。

并非所有厕所都是“男左女右”，更何况有时二者不在一个平面。那些精巧的抽象图案，如烟斗对高跟鞋、领带对裙子、身材粗壮对娇小苗条，现在看来都很可疑。难道女性就不能抽烟，男性就不能穿裙子？至于以胖瘦定性别，那就更没道理了。时



心与溪俱闲 (中国画) 任德洪

乍浦路北海宁路口竖起了一个镂花拱门，门楣上写着斗大的招牌：酱园弄，正对应路口一堵高墙上那黑黝黝的“酱园”二字，营造出酱香氤氲的作坊街氛围，这是电影故事里的年代。

影视布景置于现实环境，局部的做旧和整体的代差或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。“酱园弄”里的北海宁路闻不到浓郁的酱香，所见是空寂的弄堂和萧瑟的门市，是为建设北横通道居民和商铺搬迁后留下的残照。倒是路口的胜利电影院修旧如旧，搭配着乍浦路上的“酱园”街景，隐约有点旧市井的影子。

我与北海宁路曾有一段浅浅的交集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大学毕业，工作的第一个单位，就坐落在北海宁路30号。犹记得去单位报到那日，正是八月里火热的天气，从北海宁路上转进围着罗马柱的走廊，一幢灰白色的小楼突兀在眼前。过了前厅，两边是一间间大小无差的房间，格局不似普通居民楼宇，也不像旧时有着前厅后堂的豪宅，后来了解到北海宁路在近代属上海公共租界，这里曾因聚集大量日本旅馆而名噪一时，这幢冠名“东海宾馆”的小楼是否由早先的旅馆改造而来，却未作详细考证。攀上窄窄的木质楼梯，走进二楼朝西北的一间小房间。这，便是我职场的起点了。办公室小，只容得下三张办公桌，屋角还堆着几大摞散着油墨香的新出期刊。领了办公用品还有一套印有单位名称、编号为8的搪瓷碗，和同事打过招呼，侧着自己身子挤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定，窗户搭扣着铁钩子，敞开着，竹帘子半卷，避着下午西北边的日晒，又要进一点穿堂风，和屋里的一台摇头扇一起驱散些溽热。古早的房屋格局和我小时候所住石库门颇为相似，颇有亲切感。

北海宁路和海宁路南平行，东起吴淞路，西至乍浦路，宽10余米，长不足200米，一片纺锥形的居民区将两条路隔离开来，吴淞路那头坐着太湖饭店，乍浦路一头则屹立着胜利电影院。沿海宁路一边是鳞次栉比的商铺，车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背侧的北海宁路则安静得多。上班的小楼隐于深处，离北海宁路二三十米，鲜有人声传入，倒是有清脆的铃声不时传来，那是北海宁路上63路公交车终点站发车铃按时鸣响。

走出弄堂，上世纪末的北海宁路是寻常的小马路，两边是一众清水红砖墙，二楼立着坡顶老虎窗的旧式小楼，窗口伸出的竹竿上晾着五颜六色的长裤短袖，临街是三三两两的小铺，经营着各样的买卖。街市的吆喝声和闷巷的烟火气互相萦绕，弥漫着平淡的日常。单位隔壁是一家卖各式瓷器和炊具的商店，那些泛着亮光的

驰隙流年

张为民



自从有了上海书展(上海书市)等出版发行盛会，我都是组织参与者，虽然级别很低、层次不高。

今年的上海书展，我也在场，而且出席三场活动。我乐意参加这三场活动，因为既是活动主办方对我的鼓励，也是我辛勤努力的一种体现，有些享受，也愿意分享。

8月14日，参加《上海出版年刊(2024)》首发式暨座谈会，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召集，我受邀讲述这卷年刊的编纂情况。

自从2019年被聘为《上海市志·新闻出版分志·出版卷》副主编参与编纂1978—201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之后，受托继续努力，开始从2020年每年编纂一卷《上海出版年刊》，以求及时、客观、完整地记载年度

上海出版概貌，我被聘为副主编兼编辑部副主任，主理编纂工作，迄今已出版五卷，感觉很不容易，而且还获承诺会在韬奋纪念馆专设一卡座显示“《上海出版年刊》编辑部”。上海的众多出版、印刷、发行掌门人和领导、研究部门很多同事在过往的年份中都给予这本年刊的大力支持，尤其是历任主编徐炯、高韵斐、权衡和胡国强、忻愈、赵书雷等的肯定。

15日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《全球书店步行》(第五辑)新书分享会，我是这本书的主编，受邀参加，也愿意讲些其中的故事。

《全球书店步行》是套系列读物，第五辑是最后一册。自2021年“全球书店步行”项目启

动，我们用五年时间、五卷书册，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藩篱，以脚步丈量世界的书页，以文字编织书店的经纬。2021年10月起陆续在上海市书刊发行业协会主持的“上海书展”微信公众号刊发“全球书店步行”文

来，它们更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行路上的永恒灯火。

作为主编，成就感是现在才出现的。在整个近五年的征集、修改、等待和交流中，一直以“经常庆功才能成功”自励，每周日在“上海书展”微信公众号上一篇篇地首发。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功，现也在考虑重新按国别排列重版事宜了。

这套书，实实在在为爱书人、卖书人提供了不同国家、不同书店及经营者对书、书店的理解和研判。有很多细节和运作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17日，《2024·上海好书》出版座谈会是上海三联书店举行的活动。之前已出版《2023·上海好书》。看到这本书的出版，

西式刀叉，勾勒着细密纹路的骨瓷即便今日看来依旧是奢华精致的。几条曲里拐弯的小弄堂在北海宁路上开了出口，日影移去，弄堂口早有人泼了凉水，摆出了小桌小椅，那是从逼仄的阁楼里延伸出来的生活空间。多的还是各种吃食店，卖现炒米花糖的是两个外省兄弟，一个将米坯子放进大油锅中轻炸，几下几下，米粒子膨胀开，小米橙黄，紫米油亮，看着诱人。火候到时，用大筛子将米粒子抄进另一口已熬制黏稠的糖锅中迅速拌匀，随即倒入放在桌上的模具中压实。另一个则不慌不忙，慢悠悠整理着米花糖的边边角角，待冷却后再用锋利的长刀一块块齐齐整整切开，全然不顾排着长队的顾客的催促，摊主是懂“饥饿营销”的。秋季，冒出一家卖糖炒栗子的门面，是弄堂口底楼人家借地利破墙而

开。屋子里着一件汗衫的老板亲自掌勺，一把大铲子在铁锅里上下翻飞，甜滋滋的栗香弥漫开来，如无形的招牌，引来一波又一波的客流，多年后，这家挂着“好好栗子”店招的小店竟成了网红糖炒栗子铺，亦是北海宁路上的传奇之一。

彼时，胜利电影院每天中午12点会放映一场电影，多是一些过档影片，如《小街》《老井》《一半海水一半火焰》等等，票价颇优惠。夏令时节，单位午休延至下午2点，时间刚好好看场电影。那个夏天，在影院幽暗凉爽的放映厅里度过了十多个慵懒的午后。卖葡萄的流动摊主每天下午会推着板车准时出现在影院门口，等着影院散场后涌出的观众，八角一斤的紫皮葡萄甜而不腻，常买上一串作为下午的零食。

在北海宁路待的时间不长，半年后，单位搬到他处办公。之后，虽常路过，却极少专门拐进去看看。驰隙流年，恍如一瞬星霜换。印象中的画面已然褪色，虚拟的叙事亦与之一无二。依旧是日光灼灼的夏日，坠入时光隧道里的北海宁路静若处子，抑或等着下一回，慢泻流光，渐映瓷瓷绿茗。

一年一度，有些享受，有些快乐

汪耀华

章至2025年5月，累计刊发了102篇，分五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这一路，我们从身体被困的“云游”启程，穿越数字时代的喧嚣，目标始终有一个——人类文明最本真的精神驿站——实体书店。而今，当这趟旅程行至第五辑的站点，回望来路，每一家书店都如星辰般闪烁于记忆的夜空；凝望未

感觉有些欣慰。上海好书的评选是在市委宣传部出版处指导下，由上海市出版协会、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、上海市书刊发行业协会合作推出的一项工作。我被推为编委也就为具体操办提供了难以推卸的职责。好在有三位协会掌门人胡国强、彭卫国、李爽的信任，使我在不参与评选的前提下，经办了从征集到集结的基础工作，也承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、责任编辑殷亚平的不懈努力，书的出版和活动都很顺利。

上海书展，我会继续走走看看，聊聊天说说事。一年一度，有些享受，有些快乐……

十日谈

书之展，人之约
责编：郭影

走出“算法”，前往百花齐放的阅读盛宴，这里就是上海书展。